

◎ 领袖人生纪实丛书 ◎

鄧

小

平

人生纪实

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图书馆 编

下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邓小平

人生纪实

下

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图书馆 编
◎ 领袖人生纪实丛书 ◎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目 录

下 册

历 程

出访日本	1001
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曲折过程	1009
“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	1018
农村改革	1031
关注三峡工程	1036
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	1043
视察新疆	1055
金融改革	1065
住房制度改革	1068

交 往

揭开海军历史新一页——与叶飞	1071
知人知心——与班禅	1079
应该重视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与丁肇中	1082
为什么不叫黄昆搞本行——与黄昆	1086

知名已久——与金庸	1089
“你 1972 年的中国之行是明智的、勇敢的” ——与尼克松	1093
多次会见的外国朋友——与基辛格	1099
“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与哈默	1104
“我总算通过了考试”——与法拉奇	1112

珍 闻

“你的书写得很好”	1119
救戏	1121
请北京市委处理人艺问题	1122
军队指挥自动化	1123
“武器要更新”	1126
访美花絮	1128
“我也是代表团的成员”	1137
开放 414 招待所	1141
“要考虑天津的发展方向”	1143
参观兵马俑	1148
“二汽生产好，管理也不错”	1150
一句名言的由来	1154

第九编 总设计师

(1982 - 1989)

历 程

政治体制改革	1159
中共十二大	1166

中央顾问委员会	1171
下苏杭	1177
台湾问题	1189
香港回归	1196
澳门回归	1208
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的改革	1213
第一次视察经济特区	1221
国庆 35 周年庆典	1237
十二届三中全会	1243
“863” 计划	1246
十二届六中全会	1250
对外政策的“两个转变”	1254
百万大裁军	1259
中共十三大	1265
中苏关系正常化	1271

交 往

人间重晚晴——与谭启龙	1280
支持“荣老板”——与荣毅仁	1282
为了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与霍英东	1288
关心“宁波帮”——与包玉刚	1291
“后勤部长”——与陈景润	1294
不忘老朋友的生日——与爱泼斯坦	1299
谢谢你们——与吴健雄等	1302
“我知道你比较了解中国”——与布什	1306
“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与华莱士	1313
“我们要把好的时期记住，坏的时期忘掉” ——与胡萨克	1321
“我们非常关注非洲的发展和繁荣”	

——与穆塞韦尼	1326
“我很高兴结交你这位年轻的朋友”	
——与拉吉夫·甘地	1331
“两个德国必须统一，中国同样必须统一”	
——与施密特	1338

珍 闻

中国的主权神圣不可侵犯	1345
“三个面向”	1347
“万里有同心，一年一会面”	1348
作出“严打”决策	1352
厦门之行	1354
为北京饭店题写店名	1358
《双猫图》的来历	1359
关心南京中山植物园	1360
“路子要走得宽一些”	1364
“漓江的水变清了”	1367
“我回到家了！”	1372
“看看你们的开发区”	1374
接见话务员	1378
谈话中的幽默	1380

第十编 晚年情怀

(1982—1989)

历 程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确立	1383
--------------------	------

开发浦东	1390
南方谈话	1395
“要把杭州的旅游业好好发展起来”	1418
最后一次视察	1421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1427

交 往

高手之间的较量——与聂卫平	1433
“用桥牌来训练脑筋”——与杨小燕	1436
唇齿相依，不忘老朋友——与金日成	1437
“见到老朋友，我非常高兴”——与穆巴拉克	1445

珍 闻

离开领导岗位	1451
最后一次会见“正规记者”	1455
“亚运会建筑搞得好”	1458
逛一逛京城	1461
和睦的家庭	1465
晚年的日常生活	1468
《邓小平文选》的出版	1474
再道一声：小平您好	1478
在大海中永生	1482

编后记	1488
-----------	------

说明	1489
----------	------

出访日本

1978年10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邓小平作为第一位中国国家领导人到日本访问，并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互换批准书仪式。

随同邓小平出访的有邓小平的夫人卓琳，外交部部长黄华和夫人何理良，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和夫人经普椿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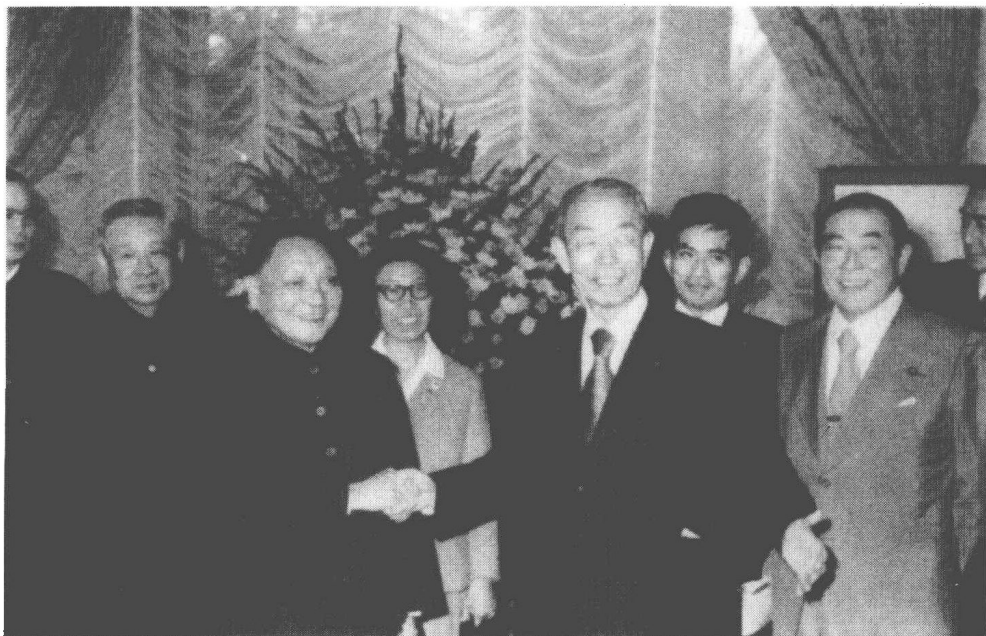
邓小平一行乘坐的三叉戟专机于22日下午4时20分降落在东京羽田机场。

日本外相园田直早已等候在机场。当邓小平的专机刚刚停稳，园田直外相破例地急步奔入机舱迎候邓小平。

当邓小平和园田直外相走下飞机的舷梯时，机场鸣礼炮19响。邓小平同前来迎接的有关人员一一握手后，在园田直外相的陪同下乘车前往下榻地——赤坂宾馆。

23日上午，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在国宾馆举行盛大仪式，欢迎邓小平一行。

上午9点半左右，身着深灰色中山装的邓小平由福田陪同检阅了由100多名陆上自卫队士兵组成的日本仪仗队。乐队高奏两国国歌。



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邓小平访日期间与日本首相福田赳夫握手。

邓小平的步伐是那样的稳健有力，内心充满自信。

10 时左右，邓小平在安倍官房长官的引导下，前往首相官邸，礼节性地拜会福田首相。

福田首相先在一楼的吸烟室接待了来访的邓小平副总理。

“昨晚休息得好吗？”福田问。

“因为没有时差，休息得好，谢谢！”

两人随即并肩来到二楼首相办公室。稍事寒暄后，邓小平便从容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熊猫”牌香烟，并按中国的礼节递给了在座的每一个人。这样一来，气氛立即变得轻松起来。

邓小平首先对日本政府的邀请表示感谢。他说：“几年来一直希望有机会来东京访问，现在终于实现了。十分高兴和首相相识，这次是第一次见面，可是相知已久。有机会见面交换意见，是十分有益的。”

“近一个世纪日中关系的不正常状态终于宣告结束了。条约是为了建立日中两国的永久和平友好关系，这是邓小平副总理下决断的结果。”福田说。

接着，两人共同回顾了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经历、波折和困难。

邓小平高度评价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邓小平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对中国，对日本，甚至对世界都是件大事。虽然有一部分人反对，但几乎全体中国人民、全体日本人民都欢迎这个条约，因为条约反映了他们的愿望。

福田说：“在任何国家都一样，作决断时总是有人要反对的，这次的条约，在日本原来持慎重态度的人也都表示支持，除极少一部分人外，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表示欢迎和赞成。我调查了一下世界舆论，世界各国除一小部分外，都赞成这个条约。”

“少数人反对总是有的。中国国内也有，一年半前还有‘四人帮’嘛。”邓小平诙谐的话语，引得全场的人一片笑声。

福田说，我们虽说是第一次见面，可是好像很久前就见过似的。日本有句俗语叫穿着浴衣进行会谈，希望我们毫无拘束地随便交换意见。

当福田表示自己只对战前中国的情况是熟悉的，战后由于种种情况，工作忙，没有机会访华，很希望有机会到中国访问时，邓小平掐灭烟头，侧了一下身子，回答说，本来我是想在会谈时再说的，既然首相阁下提出来了，现在我就代表中国政府邀请首相在方便的时候访问中国。

福田首相愉快地接受了邓小平的邀请，点头允诺。谈到邓小平将要到日本关西访问，福田说那儿有很多从中国传来的文化遗物，有些已经在中国失传了。随之话题转到了中国的汉字，福田认为，中国汉字的变化很大，看报纸就看不大了。日本一直沿用原来的汉字。

“从汉字可知，两国的友谊是悠久的。”邓小平说。这时，福田首相递给邓小平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几个字，并不无得意地说：“我的名字就是《诗经》里面的，也可以说是中国的名字。”

邓小平说：“简化了就不好办了，就看不懂古文了。”

10 点半，在首相官邸的一楼大厅开始举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换文仪式。

在乐队高奏的乐曲声中，福田、邓小平以及两国的外长脚踏红地毯进入了会场。会场中央摆放着由白色和黄色的菊花以及红色的石竹花装饰起来的太阳旗和五星红旗。

福田和园田直，邓小平和黄华并排坐于罩着绿色绒布的桌前。仪式开始后，全体起立奏两国国歌。随后，园田直和黄华用毛笔先后在双方分别用日文和中文写成的批准书上交叉签字。此刻是 10 月 23 日上午 10 时 38 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从此生效。

邓小平和福田相互举杯。随即，邓小平放下酒杯，再次走到福田跟前同他拥抱。福田对邓小平的这一举动大为吃惊，显然是缺乏思想准备，因此表现得有些慌乱，不知所措，姿势也显得僵硬。站在一旁同黄华握手的园田直看得有点愣神了，没料到邓小平随即走过来和他拥抱，结果由于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显得十分狼狈和有几分滑稽。

23 日下午 2 时半至 5 时 25 分，福田与邓小平在首相官邸接待室举行第一次会谈。

中方参加会谈的有黄华、廖承志、韩念龙和中国驻日大使符浩等人。

福田首先代表日本政府和国民表明，日中两国要建立持久的名副其实的睦邻友好关系。

他还说，特别是本世纪以来，连续发生不幸事情，我感到非常遗憾，并进行反省。今后不应再重演。战后日本已改变姿态，决心不再做军事国家。

福田谈到日本的“全方位和平外交”，是不敌视世界上任何国家，也就是要为同一切国家都友好而努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全方位等距离外交”，他强调要坚持

《日美安全条约》。并确信《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不仅能贡献于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而且能贡献于世界和平。

邓小平说：我们两国有两千多年友好交往的历史。在两国友好的长河中，不幸的历史只有几十年时间，这不过是很短的插曲。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法律上、政治上总结了我们过去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从政治上更进一步肯定了我们两国友好关系要取得不断的发展。中日要世代友好下去。

“坦率地说，在现在这个动荡的局势中，中国需要同日本友好，日本也需要同中国友好。尽管你们交的是个穷朋友，但是这个穷朋友还是有一点用处的。”邓小平继续说。

说到这里，福田连连表示“不是，不是”。

邓小平还对国际局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会谈结束后，福田向记者谈及对邓小平的印象：“非常了不起。总之，非常了解世界形势，虽然同对方立场不同。”

当天晚上7时半，福田在首相官邸设宴欢迎邓小平一行。

福田和邓小平分别致了祝酒词。

福田首先回顾了日中两国具有两千年以上的友好交流的悠久历史，说：“在漫长的历史中，我们两国关系的发展是无法分开的，到了本世纪，经历了不幸的苦难。”讲到这里他离开眼前的讲稿，突然冒出一句：“这的确是遗憾的事情。”然后，又接上讲稿说：“这种事情是决不能让它重演的。这次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正是为了做到这一点而相互宣誓。”对于福田突然冒出的这句话，在场的日方译员没有翻译。不过，这话还是传到了邓小平的耳朵里，并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登了出来。宴会结束后，有记者就此追问福田时，他避而不作正面回答，只是说：“由于原稿字小，有三处不能读。”

邓小平在致词中说：

中日两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但是两国应该而且完全可以和平友好相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明确地规定，中日两国不谋求霸权，同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势力。这是国际条约中的一项创举。条约的这项规定首先是中日两国自我约束，承担不谋求霸权的义务，同时也是对当前威胁国际和世界和平的主要根源霸权主义的沉重打击。

宴会结束后，邓小平在福田的陪同下来到大餐厅，欣赏了由日本财团法人“才能教育研究会”的3岁至12岁儿童的小提琴演奏，并同演员们合影留念。

25日上午10时，福田和邓小平第二次会谈在首相官邸接待室举行。

一见面，福田就对邓小平连日来表现出来的充沛精力表示赞叹：“你真是一位超人，一点倦色都没有。”

邓小平笑着说：“我多次说过，高兴时就不觉得疲倦。”

接下来，双方就朝鲜问题、台湾问题、中日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

在谈到台湾问题时，邓小平这样说：

我们实现台湾归还祖国也要充分考虑到台湾的现实。日本方式也是尊重台湾现实的一种表现。美国总希望我们承担义务，不使用武力解放台湾。我们说，什么时间、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无权干涉。实际上我们承担了不使用武力的义务，反而会成为和平统一台湾的障碍，使之成为不可能。那样，台湾当局就会有恃无恐，尾巴翘到一万米高。

在场的人听到这里，都为邓小平形象生动的语言而大笑。

邓小平还谈道，中日双方由于各自的环境不同，对一些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比如你们叫尖阁列岛，我们叫钓鱼岛的问题，就是有一些看法不同，可不在会谈中谈。我同园田外相讲过，我们这一代人不够聪明，找不到合理的解决办法，我们下一代会比较聪明，大局为重。

但是这一敏感问题，在几个小时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又被突然提了出来。

25日下午4点，邓小平出席在东京日比谷的日本记者俱乐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

参加记者招待会的400多名记者分别来自时事社、共同社、路透社、合众国际社、美联社、法新社、德新社等著名通讯社。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在出访时第一次同意以“西欧方式”同记者见面。

邓小平从容、巧妙地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多少令那些企图从这位共产党领导人的即席回答中寻找破绽的西方记者失望了。

但是，一位日本记者提出了中日双方早先约定的这次中日双方都不涉及的问题——尖阁列岛（中国称之为钓鱼岛）的归属问题。

尖阁列岛，中国称钓鱼岛，是台湾省的附属岛屿，属中国领土，甲午战争后被割



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期间，与日本记者握手。

让给日本。此刻，当日本记者提出这一敏感问题后，会场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大家都屏住呼吸，看邓小平如何回答。

邓小平非常轻松地说：

尖阁列岛，我们叫钓鱼岛，这个名字我们叫法不同，双方有着不同的看法，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我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倒是有些人想在这个问题上挑一些刺，来阻碍中日关系的发展。我们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等十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一代缺少智慧，谈这个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下一代比我们聪明，一定会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法。

邓小平把这么重要的领土归属问题，说得如此的合情合理，确实令全场的记者折服。

在此次访问期间，邓小平还于24日上午，专程拜访了前首相田中角荣后，又前往东京大仓饭店拜会了时任自民党干事长的大平正芳。

邓小平说：“昨天已经见过面，今天是来正式拜会。”

“阁下不忘老朋友，特地来看望，十分感谢。”大平正芳说道。

邓小平说：“今天是为了表示感谢而来。1972年阁下和田中前首相一起访华，实

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为发展中日关系开辟了道路。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我们感谢福田首相的决断，同样也要感谢田中前首相和大平正芳外相。”

1972年9月25日，一架日航DC-8型专机，载着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和外相大平正芳等人于北京时间11时30分降落在北京机场。

田中、大平此行的目的是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在机场迎接日本客人。相互敌视了20多年的亚洲两个大国的手终于紧紧地握到一起了。

大平外相自始至终参加了谈判。

9月29日上午10时20分，《中日联合声明》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正式签字。大平外相是日方的签字人之一。

签字仪式结束后，大平外相立即赶到设在民族文化宫的新闻中心，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对《联合声明》的基本内容做了说明。他说：“日中结束不正常的关系是对亚洲及世界和平的重要贡献。”他以坚定的口吻宣布日台关系“在《联合声明》中虽没有触及，日本政府的见解是，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华和平条约（即‘日台条约’）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并宣告结束”。就是说日本与台湾正式断绝了外交关系。

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后，大平正芳又为推动中日友好关系作出了贡献。中国人民始终记住为中日友好奠基的田中前首相和大平前外相。

这次邓小平访日，专程拜访大平正芳，令他非常感动。

大平正芳说：“中国经济建设取得很大发展。我对日中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的顺利进展，感到由衷的高兴。期望通过副总理阁下的访日，使两国关系进一步飞速的发展。”

谈话充满着亲切友好的气氛。

大平正芳还对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为日中友好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并指着在座的廖承志说：“和廖先生是老朋友了，见了他就好像到北京出差似的。日本在北京有两个大使。”说着他指了指佐藤大使和廖承志，接着说，“廖先生是中国人，但日本话讲得比我好。”

邓小平马上指着廖说：“他从小学就在这里读书，一直到中学。在中国他是高级知识分子，在日本是小学生。”

邓小平和大平的会见，虽说是初次，但却如久别重逢的朋友一样，畅叙旧情。

邓小平访问日本期间，参观了日本的企业，感慨地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他对日本企业界元老土光敏夫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要比世界落后 20 年，“中国荒废了 10 年，在此期间，日本等其他国家进步了，因此，里外落后了 20 年”。邓小平表示，中国要努力学习外国的一切先进经验和先进技术。

邓小平的这一坚强决心，给日本朋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曲折过程

邓小平多次说过，我是热心于中美关系的。从70年代中期开始到90年代初，邓小平为中美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1974年4月，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

此时的纽约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

4月10日，邓小平在一片关注声中，走上联合国大会讲台，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赢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致称赞。

4月14日，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美国代表团团长基辛格为中国代表团举行宴会。

邓小平、乔冠华、黄华、章含之等出席。

美国方面出席的有：基辛格、斯考克罗夫特、洛德等。

基辛格安排这次宴会，除一般礼仪外，主要是与中国方面谈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

稍事寒暄，宾主开始切入正题。

“我们美国政府正致力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努力，研究如何实现一个中国的设想，但一时想不出办法来。”基辛格推托说。

其实，尼克松总统早在1973年11月派基辛格第六次访华时，已为实现一个中国的设想想出了办法，并对中国作出了承诺：“总统表示，在任期头两年，解决好与台湾的问题，削弱驻台美军力量，美中互设联络处。在后两年走类似日本的方式，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同中国建交，与台湾保持某些民间往来。”

邓小平非常清楚，美国政府并非“一时想不出办法来”，而是尼克松总统被“水门丑闻”搞得焦头烂额，一时抽不出时间来。

“博士，中国政府希望这个问题能较快地解决，但也不着急，我们能够体谅美国政府的困难。”邓小平笑了笑，很有分寸地说。

许多年后，基辛格回忆他第一次见到邓小平时的情景时说：说实话，我那时不知道他是谁。因为他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所以我们那时认为他是中国代表团的一名顾问，甚至不知道他是中国代表团的团长。但他处理事情的果断能力

以及对事物的洞察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74年8月，尼克松总统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副总统福特继任总统。福特继任后表示，美国对华政策不变，将在自己的任期内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但是福特总统在上任后的一段时间内，把注意力集中于美苏“缓和”，加之受到美国反华势力的压力，因而对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并不积极，而是采取拖的方针，在台湾问题上、在两国关系的发展中制造了一些麻烦，采取了一些有违《上海公报》精神的行动。

1974年11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

邓小平先后同基辛格进行了5次限制性的会谈。

会谈的焦点是台湾问题。

基辛格抛出了事先准备好的方案。他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处境与其他国家不同：一是美国同台湾订有《共同防御条约》，二是美国国内存在着一股亲台势力。因此，一、美国愿意按“日本方式”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但要在台湾设“联络处”。二、美国将在1977年撤完驻台全部美军，但还没有找到妥善解决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问题的方案，希望中国声明和平解放台湾，以便美国考虑放弃美台“防御关系”。

很显然，基辛格提出的方案表明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有所后退。

邓小平说：

从本质上讲，美方这些方案不是“日本方式”，实际上还是“一中一台”的方式。无非是一个倒联络处的方案。这个方案，我们难以接受。至于美国同台湾的防御条约问题，如果中美关系正常化，按照《上海公报》的原则，一定要保证废除这个条约。按照你们的方案不可能解决正常化的问题。

关于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正常化，我们三个原则，不能有别的考虑：一、坚持《上海公报》的原则，不能考虑“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或变相的“一中一台”，如我们所理解的倒联络处，实际上也是“一中一台”，中方不能考虑。二、台湾问题只能在中国人之间作为内政自己来解决。至于用什么方式，和平的，还是非和平的，如何解决，那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三、作为一个原则问题，我们不能承认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其他国家参与什么保证，包括美国的保证。